

市场化改革、地方政府投资 与产能过剩治理

孔令池¹

(南京大学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南京 210093)

【摘要】产能过剩意味着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失衡,成功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资源配置功能的合理发挥。文章利用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从产能过剩视角,实证检验了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制衡关系,并采用2000-2009年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优化了资源配置,对产能过剩的化解成效明显;地方政府投资规模扩大,促使产业发展脱离了合理的演进规律,加剧了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投资规模较低时,市场化水平提升表现为对产能过剩的显著抑制作用,而随着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大,市场机制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被不断弱化,负面影响逐渐凸显。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 地方政府投资 产能过剩 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912(2020)11-0052-09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而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焦点,就在于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挤占了大量的生产要素,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使得投资效率下降、企业效益下滑、行业亏损及逆淘汰等,蕴含着巨大的经济社会风险。因此,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关于产能过剩的成因,国内学者更多倾向于从地方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债务、以考核GDP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地方官员变更、地方政府间竞争、政府补贴、产能管制政策、行政审批、国有企业利益机制等角度解释产能规模持续快速扩大问题^{[1][2][3][4][5][6]}。国外学者更多偏向于从生产商竞争博弈、低集中度市场结构、价格合谋、过度进入、宏观需求冲击、经济周期的微观表现等角度展开分析^{[7][8][9]}。国内学者也有相关研究,他们认为从“政府失灵”角度对诱发产能过剩的原因进行阐释,并不能解释其久治不愈的根源,而“市场失灵”有其内在逻辑合理性,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自然现象^{[10][11][12]}。上述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政策^[13]。站在持有“体制扭曲”观点的视角来看,持续地完善市场机制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有效途径。然而,范林凯等(2015)^[14]却指出,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伴随着中国市场化体系的不断健全,产能过剩却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性原因:第一,市场机制的完善,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是负向的;第二,改善市场机制,显著提高了淘汰落后产能效率,但是这一积极效应,却被某种违背市场规律的干预行为削弱。由此可见,厘清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的重

¹**作者简介:**孔令池(1990-),男,江苏如东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协同创新项目“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跨界协同治理”(GXXT-2019-039),项目负责人:洪功翔;安徽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攻关研究项目“安徽县域经济增长新动能转换研究”(2019CX080),项目负责人:刘彩珍

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将利用 2008–2014 年中国 30 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重点考察市场化改革、地方政府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验证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制衡关系。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国内直接研究市场化改革对产能过剩影响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试图直接研究市场机制这一更加本源的影响资源配置的因素，是对现有文献的有力补充；二是理论层面上，现有研究是碎片化的，片面强调体制扭曲的单方面作用，显然无益于合理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矛盾，本文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纳入同一框架下系统分析，检验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有效拓展了现有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在实际研究中，产能过剩一般指行业的实际生产能力超过了社会需求的状态^[15]。因此，有必要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一种是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和健全情况下的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会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促使市场竞争加剧，且其能够有效协调并引导经济主体之间供需不断趋于动态均衡；另一种是由于体制缺陷对经济主体行为的扭曲而导致的产能过剩，这种体制性产能过剩可能会破坏市场协调供需均衡的能力。上述两种情形，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为了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应着力于完善市场机制。通过恢复正确的价格信号与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良性竞争机制，使企业捕捉相对准确的市场信息，面对真实成本与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以实现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的效果^{[16][17]}。修宗峰和黄健柏(2013)^[18]实证检验发现，市场化改革对地方国企类和民营类上市公司产能过剩的抑制效果明显。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更有助于发挥市场机制在利用分散信息、协调供需均衡、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的高效率性，从而进行正确的微观决策。徐朝阳和周念利(2015)^[19]研究指出，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解决当前中国部分行业产能分散和过剩问题的最有效办法。臧成伟(2017)^[20]实证检验发现，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完善法制环境等市场化改革取向，有助于提升企业存续的生产率门槛。徐朝阳等(2020)^[21]通过理论模型、数值模拟以及政策实验发现，由于我国要素市场改革相对滞后，服务业部门会面临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而工业部门则会出现供给能力扩张速度超过其需求增长的结构性产能过剩。

研究假说 1：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优化了资源配置，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

在中国的制度体系下，市场选择与政府行为具有较强的联动性特征。孔令池等(2017)^[22]认为，在现有的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框架下，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投资冲动，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任期内能产生收益的项目或者能产生政治明星效应的行业，大大削弱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可能会导致投资过度进入某个项目或行业。此外，地方政府对于本地企业的保护和支持，严重妨碍了优胜劣汰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发挥，加大了过剩产能的退出障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徐业坤和马光源(2019)^[4]从地方官员变更的视角，研究认为，官员更替时，通常会发生“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现象，继任官员会倾向于高投资、过度借贷等方式，调动其所掌握的资源短期内“大干快上”，有意识地将资源或要素投入不同的或者新兴的重点发展产业，推动企业产能扩张，进而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加剧产能过剩。刘满凤等(2019)^[23]研究认为，出于保就业的目标，政府可能会通过财政投资或持续性以贷款为僵尸企业输血的方式，促使企业维持经营，也可能利用金融机构通过给予更为宽松的贷款限制以间接扶持其偏好的企业，上述行为扭曲了资源配置，趋于不断加剧产能过剩。颜晓畅和黄桂田(2020)^[5]研究发现，过度的政府财政补贴，会促使企业形成高度依赖性，诱发其做出逆向选择行为，将资金更多投入低风险、低成本、低技术、低进入门槛的项目中，这种低水平规模扩张行为往往带来低端产品产能过剩。

研究假说 2：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大，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化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

三、模型与变量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考察的是省级层面市场化水平与地方政府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EC_i = \alpha + \beta_1 Market_i + \beta_2 Govern_i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其中，EC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产能过剩指数。Market 表示市场化水平，Govern 是地方政府投资。X 是由多个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 ε 为复合误差项。

由于市场化水平与地方政府投资之间存在交互影响，我们加入了 $Market \times Govern$ 这一交互项衡量该效应。

$$EC_i = \alpha + \beta_1 Market_i + \beta_2 Govern_i + \beta_3 Market_i \times Govern_i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二)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产能过剩指数(EC)：本文借鉴刘航等(2014)^[24]的研究方法，采用地区×行业×年份数据，测算出各地区分行业的潜在产出(1)，分别按地区加总得出该地区全部行业的潜在产出，再与实际产出相比，结果减去1，即为省级层面的产能过剩指数。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 核心解释变量。

(1) 市场化水平(Market)：王小鲁等(2017)^[25]通过编制《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分别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市场的法制环境等5个维度测度了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本文直接借鉴其研究成果，采用市场化总指数作为衡量市场化水平的代理变量。

(2) 地方政府投资(Govern)：本文使用地方政府投资额占GDP的相对比重，近似衡量地方政府使用财政资源的投资意愿。由于地方政府投资内容庞杂，而现有的统计年鉴仅汇报了地方政府总的财政支出金额，因此这里借鉴张卫国等(2011)^[26]的逐项累加法，最终选取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等11项内容的加总作为地方政府投资额的衡量指标。¹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5年《中国财政年鉴》。

3.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的有益成果，选择如下控制变量：(1)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在于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精神，故而本文借鉴李宏彬等(2009)^[27]、孔令池(2020)^[28]采用的测算方法，企业家创新精神(IE)通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授权数之和加以衡量，并选取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作为企业家创业精神(BE)的衡量指标；(2)人力资本(Human)参照樊纲等(2011)^[29]的方法，采用人均受教育水平予以反映，具体计算公式为：(小学学历人数×6+初中学历人口数×9+高中学历人口数×12+大专及其以上学历人口数×16)÷6岁及以上人口数；(3)外商直接投资(FDI)使用FDI占GDP的比重予以衡量；(4)为了验证国有垄断利益集团对产能过剩的影响，选取工业部门的国有控股企业资产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予以反映(State)；(5)信息化水平(Inform)设置为地区电信业务总量与全国均值的比值。如无特别说明，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200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估计结果

表1中分别报告了OLS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以及系统GMM估计的回归结果，以便于比较。其中，列(1)中的结果简单反映了市场化水平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与研究假说1的预期相一致，二者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列(2)中，我们加入了地方政府投资变量以检验政府干预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效应，同时加入企业家精神、FDI、人力资本投资等作为控制变量。列(3)在列(2)的基础上加入年份，进一步控制时间趋势的影响。列(2)和列(3)的回归结果均表明市场化水平与产能过剩的负向关系十分稳健。第(4)列采用固定效用回归的估计方法，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结果再次肯定了市场化水平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显著为负。第(5)列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估计方法，与上述估计方法的研究结果依然保持一致。值得说明的是，第(2)–(5)列中，地方政府投资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大可能是引发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 | OLS 回归 | | | 固定效用回归 | 系统 GMM 回归 |
|------------|-----------------------|-----------------------|-----------------------|-----------------------|-----------------------|
| | (1) | (2) | (3) | (4) | (5) |
| L. EC | | | | | 0.7037*** (11.00) |
| Market | -0.1306*** (-8.43) | -0.1659*** (-3.52) | -0.1566*** (-3.27) | -0.1101*** (-2.90) | -0.1403*** (-3.13) |
| Govern | | 0.2099*** (3.41) | 0.2113*** (2.73) | 0.2876*** (4.55) | 0.2391** (2.07) |
| IE | | -0.0485*** (-5.34) | -0.0472*** (-5.04) | -0.0427*** (-4.78) | -0.0087*** (-3.09) |
| BE | | -0.2175*** (-2.86) | -0.1873** (-2.46) | -0.1600** (-2.12) | -0.0344** (-2.04) |
| Human | | -0.0478*** (-3.37) | -0.0619*** (-3.84) | -0.0062 (-0.53) | -0.0060* (-1.69) |
| FDI | | -0.0270*** (-3.23) | -0.0260*** (-3.04) | -0.0115** (-2.25) | -0.0034 (-1.73) |
| State | | 0.0771*** (3.02) | 0.0499 (1.83) | 0.0206 (0.53) | 0.0189*** (3.05) |
| Inform | | -0.0084 (-1.62) | -0.0106** (-2.02) | -0.0098 (-1.05) | -0.0012 (-0.87) |
| 是否控制地区固定效应 | 否 | 否 | 否 | 是 | 是 |
|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 否 | 否 | 是 | 是 | 是 |

| | | | | | |
|----------------|--------|--------|--------|--------|-------|
| 观测值数 | 210 | 210 | 210 | 210 | 180 |
| Prob>F | 0.0000 | 0.0000 | 0.0000 | 0.0000 | |
| R ² | 0.2509 | 0.7269 | 0.7162 | 0.9768 | |
| Sargan 检验 | | | | | 0.341 |
| AR(1)检验 | | | | | 0.012 |
| AR(2)检验 | | | | | 0.166 |

注:该表中*表示 10%水平上显著, **表示 5%水平上显著, ***表示 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 t 值。系统 GMM 估计方法括号内的数字为 Z 值。下同。

控制变量方面, 我们不难发现, 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力量, 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有利于激发市场蕴含的活力, 提高新产品的竞争优势, 加快新产品对传统产品的替代速度, 促进企业工艺水平提高与产业技术水平升级, 显著抑制了产能过剩。人力资本投资的估计系数为负, 说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转“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 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FDI 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负, 说明随着市场开放的深化, 要素趋于自由流动, 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 化解产能过剩。国有企业的微观利益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强, 会过多地谋求政策支持或迎合政治考虑, 这种特殊的利益机制, 会导致国有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 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信息化水平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并不强, 说明在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 信息化水平提升的作用效应并不明显。

(二) 内生性检验

上述估计方法难以避免内生性问题, 从而导致估计偏误。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之前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性, 这里仍然有必要讨论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了 Anderson & Hsiao(1981)^[30]的方法, 采用滞后两期的被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如表 2 所示, F 统计量均大于 10, 工具变量 P 值均达到 1% 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可以得到一致性估计。进一步观察发现, 市场化水平均在 5% 的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产能过剩程度, 与前述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回归结果的内生性。

表 2 内生性检验

| | (1) | (2) |
|--------|----------------------|----------------------|
| L. EC | 0.7541*** (13.68) | 0.7055*** (13.10) |
| Market | -0.0339** (-2.19) | -0.1319** (-1.97) |
| Govern | | 0.1758* (1.92) |

| | | |
|----------------|-----------|----------------------|
| IE | | -0.0131** (-2.11) |
| BE | | -0.0294* (-1.79) |
| Human | | -0.0096 (-1.59) |
| FDI | | -0.0207** (-2.18) |
| State | | 0.0898*** (2.98) |
| Inform | | -0.0168 (-1.61) |
| 是否控制地区固定效应 | 是 | 是 |
|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 观测值数 | 180 | 180 |
| R ² | 0.9906 | 0.9942 |
| 识别不足 | 74.509*** | 79.621*** |
| 弱工具变量 | 115.558 | 118.787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样本数据选择影响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借鉴樊纲等人(2011)^[31]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更换样本，进行稳健性分析。通过对前文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市场化水平与产能过剩显著负相关，与地方政府投资显著正相关。从实证结果来看，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保持稳健。

五、进一步讨论：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制衡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需求结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与环境成本、比较优势等方面发生急剧变化，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普通机床等传统制造业将面临长期衰退和产能过剩的压力。这时，为了应对这些行业急剧调整给就业、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政府往往需要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这些行业的落后产能顺利退出市场，并促进产能过剩行业沿着产业链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不断攀升。然而，地方政府采取的各种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竞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以及产业政策的不当干预等，则是出现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政府的这种不科学的干预，又要求我们注意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和调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制度，增进市场机能，充分发挥市场在利用分散信息、协调供需平衡等方面的作用，有利于矫正导致系统性产能过剩的体制缺陷。然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理论上，市场均衡只是一种理性的模式，市场非均衡才是现实发生的模式。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条客观规律就是，只要存在市场的非均衡，就需要政府干预经济。因此，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之外的政策部门予以积极应对产能过剩。不同于以往，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增长阶段转换和体制性因素综合作用的过剩。

市场与政府间的选择并非是一个在完善与不完善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不完善的程度和类型之间，在缺陷的程度和类型之间的选择。^[32]因此，化解产能过剩不是纯粹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直接选择，而是在这两者不同组合间的选择，是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在不同程度上的制衡与选择。可以说，市场和政府关系的制衡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把握好这个度，才

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33]。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市场机制占有天然的优势，但其本身存在缺陷，可能会失灵，某种意义上或某种程度上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和规范。因此，在倾向选择市场经济时应给政府（非市场）保留一定的空间，让政府在改善市场功能方面能够有所表现。与之相对，政府调控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但是并不能替代市场作用。故而，在倾向选择政府干预政策时应该给市场留有一定的位置，让市场在完善政府功能方面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因此，这里进一步引入市场化水平与地方政府投资的交叉项，探讨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市场机制与地方政府干预的互动性特征。

前文已经分别考察了市场化水平和地方政府投资作用于产能过剩的影响效应，展现了在中国特色的制度空间体系中，蕴含市场机制的市场化水平与包裹浓厚政治气息的地方政府投资二者截然不同的作用效果。市场化水平对产能过剩的具体影响为 $-0.1299+0.2410$ ，且交叉项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当地方政府投资规模较低时，市场化水平对产能过剩具有抑制作用，随着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大，这种抑制效应趋于减弱，最终表现为对产能过剩的促进作用。回归结果较好验证了研究假说2。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化解产能过剩，这一点当前学界和政界也有普遍共识。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完善，但中国始终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顽疾，且越治理越严重，产能扩张一直非常快速。通过本文的分析，这一现状并不意味着市场化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是负向影响；相反，我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显著抑制了产能过剩，但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加深，这种作用效力被不断削弱。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化解产能过剩，不是简单地关闭或淘汰一些落后产能，关键在于优化资源配置。本文将市场化水平与地方政府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考察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制衡关系，采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8—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利用2000—2009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显著抑制了产能过剩。（2）地方政府投资的扩大，会脱离产业演进规律而过快推进，是引发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3）持续加大地方政府投资，将会扭曲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不断削弱市场机制对抑制产能过剩的正面效应，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4）此外，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深化对外开放、扩大非国有经济比重等，均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对化解产能过剩具有促进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切实控制住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发展，促使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从体制上解决行政化和大市场的矛盾，促进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有机结合，构建起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第一，从市场的根本逻辑来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关键在于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废除不符合市场原则的制度，营造自由公平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真正发展壮大起来，逐渐形成足够与政府干预扩张相抗衡的力量，以避免其对市场规律的破坏。第二，推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限制政府的“越轨”干预，政府需要顺应市场规律，逐渐淡化其经济主体意识，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参考文献：

[1]董敏杰，梁泳梅，张其仔.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行业比较、地区差距及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15(01):84-98.

[2]李建军，刘元生，王冰洁.税收负担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财政研究，2019(01):103-115+129.

[3]孙正，陈旭东，苏晓燕.地方竞争、产能过剩与财政可持续性[J].产业经济研究，2019(01):75-86.

[4]徐业坤，马光源.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产能过剩[J].经济研究，2019,54(05):129-145.

-
- [5] 颜晓畅, 黄桂田. 政府财政补贴、企业经济及创新绩效与产能过剩——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20(01):176-198.
- [6] 李富有, 王运良. 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产能过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J]. 当代经济科学, 2020, 42(04):29-38.
- [7] Davidson C, Deneckere R. Excess capacity and collusion[J]. Discussion Papers, 1984, 31(03):521-541.
- [8] Kirman W I, Masson R T. Capacity signals and entry deterr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86, 4(1):25-42.
- [9] Pirard R, Irland L C. Missing links between timber scarcity and industrial overcapacity:Lesson from the Indonesian pulp and paper expansion[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07, 9(08):1056-1070.
- [10] 贾帅帅, 徐滇庆. 产能过剩悖论与中国投资扩张之谜——一个新的解释[J]. 经济学家, 2016(11):71-82.
- [11] 林毅夫.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J]. 经济研究, 2007(01):126-131.
- [12] 林毅夫, 巫和懋, 邢亦青. “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 经济研究, 2010(10):4-19.
- [13] 江飞涛, 耿强, 吕大国, 李晓萍. 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06):44-56.
- [14] 范林凯, 李晓萍, 应珊珊. 渐进式改革背景下产能过剩的现实基础与形成机理[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01):19-31.
- [1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一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研究》课题组. 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特征、风险及对策研究——基于实地调研及微观数据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5(04):1-10.
- [16] 冯俏彬, 贾康. 投资决策、价格信号与制度供给:观察体制性产能过剩[J]. 改革, 2014(01):17-24.
- [17] 钟春平, 潘黎. “产能过剩”的误区——产能利用率及产能过剩的进展、争议及现实判断[J]. 经济学动态, 2014(03):35-47.
- [18] 修宗峰, 黄健柏. 市场化改革、过度投资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13(07):1-12.
- [19] 徐朝阳, 周念利. 市场结构内生变迁与产能过剩治理[J]. 经济研究, 2015(02):75-87.
- [20] 臧成伟. 市场化有助于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效率吗?——基于企业进入退出与相对生产率差异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17(02):135-146.
- [21] 徐朝阳, 白艳, 王韡. 要素市场化改革与供需结构错配[J]. 经济研究, 2020, 55(02):20-35.
- [22] 孔令池, 高波, 黄燕妮. 中国省区市场开放、地方政府投资与制造业结构差异[J]. 财经研究, 2017(07):133-144.

-
- [23] 刘满凤, 刘熙, 徐野, 邓云霞. 资源错配、政府干预与新兴产业产能过剩[J]. 经济地理, 2019, 39(08):126-136.
- [24] 刘航, 孙早. 城镇化动因扭曲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基于 2001—201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11):5-17.
- [25] 王小鲁, 樊纲, 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26] 张卫国, 任燕燕, 花小安.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经济增长——基于转型期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经济研究, 2011(8):26-37.
- [27] 李宏彬, 李杏, 姚先国, 张海峰, 张俊森. 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09, 44(10):99-108.
- [28] 孔令池. 制度环境、企业家精神与高技术产业集聚[J]. 中国经济问题, 2020(02):16-29.
- [29] 樊纲, 王小鲁, 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 46(09):4-16.
- [30] Anderson W T, Hsiao Cheng. Estimation of Dynamic Models with Error Compon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 1981, 76(375):598-606.
- [31]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 [32] 查尔斯·沃尔夫. 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 [M]. 谢旭, 译.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4:76.
- [33] 屈新. 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及其机制创新研究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32-33.

注释:

1 删除缺失数据的行业, 最终选择 20 个制造业二位码行业作为样本。它们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 11 项内容具体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简易建设费支出,地址勘探费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流动资金,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城市维护费,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土地和海域开发建设支出。值得说明的是,2007 年省级政府支出构成较之前年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项目进行了合并和汇总。因此,2007-2014 年省级地方政府投资额的构成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